

论 11—13 世纪西夏军法 《贞观玉镜统》^①

□ [德] 弗兰克著，岳海湧编译

摘要：译文对德国弗兰克译著的西夏军法《贞观玉镜统》进行了翻译，内容涉及西夏军法，以及宋夏军法的对比。

关键词：西夏；军法

作者简介：岳海湧（1963—），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引言

克恰诺夫教授在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参加由中亚研究委员会组织的第四届关于西藏问题研究的国际学术讲座时（1985年7月21日至27日），他向我建议，在我院发表西夏军法《贞观玉镜统》及他的俄译文，并建议同我对宋朝军事立法文献的研究一起发表。稍后，克恰诺夫教授送来《贞观玉镜统》的俄译稿，以及所附的《玉镜统》术语汇编和保存在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原件摹真本。

西夏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对西夏的国民、文字、语言和历史的研究，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国人、日本人和中国学者的知识领域，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对这方面的贡献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经克恰诺夫的建议，在同苏联学者的合作中，令人高兴地看到使这一落后局面在德国得到改观的范例。

西夏原始资料对11—13世纪东亚大陆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高度的评价。科兹诺夫于1908年和1909年通过探险考察，在哈拉浩特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印刷品和手稿，尤其是经克恰诺夫教授领导的列宁格勒西夏学研究会多年对它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②。西夏的夏—汉混合文化总的说来得到了阐明。在至今出版的西夏法律文献中，尤其是《玉镜统》，证实西夏编纂的法律深受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西夏文献对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自公元16世纪起便已消亡了的西夏语（迄今所知，最晚用西夏文撰写的碑文是在1502年）是一种汉藏语言，并且可能属这种语系中的藏缅语支。《玉镜统》作为语言比较研究的文献，便可追溯到11世纪。

西夏军法导论^③

西夏立法文献残片《贞观（1101—1113年）玉镜统》是科兹洛夫于1909年5月在西夏古城哈拉浩特（黑城遗址）探险考察时发现的。遗址中出土的手稿本和木刻本现今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玉镜统》是一种雕版印刷品，编号为唐古特第59号，目录序号为2616、2617、2618、3481、4183、4184、7764和7931。数量较多的登录号表明，登在以上目录索引中的《玉镜统》保存在不同时代印本的残片中。聂夫斯基、德拉古诺夫和克恰诺夫认为这些残片是一致的。

《玉镜统》全部由雕版印刷而成。西夏文书籍在印刷时，通常将同一印版的原文以不同开本的纸张印成。由于纸张开本不一致造成的差别总计达5厘米。《玉镜统》可能就是以不同的版次或稿样出版的，因此，关于“版本”，可能涉及不同时代、大小不同的纸张开本。

哈拉浩特的将领也使用着两种以上版本的《玉镜统》。它们现在碰巧出现在这些不同版本的残片中。所以，这些残片或者用不同开本的纸张一次性印成，或者被多次印成，总之，它们由于纸张规格不同而显出差别，以致出现不同印版的残片。

我们没有掌握关于这些残片印刷时代及印刷或复制和木刻者的任何资料，这些人在制版时或许裁剪了一些法律条款。我们从保存的残片中将一致的内容编纂了一部修订过的《玉镜统》，从而在原文中首次出现序言一页。

《玉镜统》的研究概况，在关于西夏法律文献的论文和一份专述的概要里作了介绍^[1]。

《玉镜统》不是西夏立法的唯一凭证。众所公认，《天盛（1149—1169年）改旧新定律令》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法典。通过详细审阅《玉镜统》，我们确信，在撰写这两部法律之前，西夏就有了含有刑法和民法的法典，虽然它没有保存下来，但在《玉镜统》中至少被提到两次^[2]。

《玉镜统》也不是西夏唯一有关军事制度方面的文献。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析收藏的西夏文献中还有译自中国的军事论著《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以及一份含有《孙子》传记的资料。此外，在英国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献中还有诸葛亮的《将苑》残片^[3]。

西夏和宋朝军法文献的一般区别

中国古代的军法历来依赖于两条原则——奖和罚。不论是将佐或是军卒，谁违反军法，就会受到严惩；但谁表现出众，取得战功，则予以重赏。奖赏包括物质奖赏、其他奖赏或晋升。于是，将士的行为通过奖罚得以规范。法律的这种本质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之前就已存在。然而自汉代以来，在中国封建制的治理实践中，法制屈从于儒教，在军法方面也是如此。宋朝在国家事务管理的许多方面也深受儒教的影响，这就与法律产生冲突。按现代军法观点看，当时的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或许太残酷了。从立法形式上看，进一步的冲突是在普通刑法和军法之间。宋代的刑法编集在《宋刑统》中，就内容看，它几乎全以唐代法典《唐律疏议》为蓝本。在宋代，没有用部门法形式制定的军法，相反，倒有许多种有关军事方面的令、诰被陆续颁布。我们所知的有关处罚和高度细致规定的奖赏程序总是与这些令、诰有关。宋朝军法与西夏军法《玉镜统》相比，就有着原则区别。西夏在1101—

1113 年系统地处理了内容丰富、赏罚分明的军法条款，将之编纂为法典，产生了部门法——军法《玉镜统》。

西夏和宋朝军法的进一步差别在于，宋朝的军令、军规只对某些特定地区有效，尤其是在奖赏方面，只对特定的前线作战部队有效。因为在当时，原则上认为，同是战功，与土著或国内叛乱者作战取得的功绩，比对强邻如辽、西夏或金作战时取得的功绩为小。

宋朝最重要的军法文献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军事方面的令、诰和其他形式规定的军法总共有以下四种。

一是对北方前线所有军队和军事当局的赦令。

二是《武经总要》中的有关章节。

三是元丰四年即 1081 年十二月十一日（《宋会要辑稿》第 7061 页第 1—2 段落）颁发的有关军功奖赏的赦令。

四是宋高宗皇帝于建炎初年即 1127 年七月二十四日（《宋会要辑稿》第 6747—6748 页）颁发的关于奖罚的赦令。

除以上叙述过的四类主要军令形式和文献外，还有关于奖赏内容方面的极为丰富的文献。《宋会要辑稿》第八卷中的《军赏》篇内容丰富，占满该卷第 7058—7124 页。它们涉及大量有关各项命令、呈文和指示的内容，也可从文中所含奖赏体制的各个方面了解官僚主义的情况。在宋朝，可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军事官僚作风的“缓弛”中。南宋最后十年间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以上简要叙述了宋朝军队奖罚体制的四类文献形式，通过比较显示出，《武经总要》第十四卷的内容是最为丰富、也是最具规模的。其余三类相形之下，就显得既较为简短，在材料的编写中也缺乏系统性。1127 年的赦令尤其如此。例如，它与 1004 年的赦令不同，后者惩罚性的规定以及值得奖赏的行为是分开列举的，只有 20 项条款的前一赦令甚至于都没有将奖罚措施分开列举，因而所规定的奖罚措施就显得杂乱无章。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局势紧急而在匆忙中草率就文所致。另外，《武经总要》第十四卷是非常出色的著作，它陈述了立功受奖的原因，如在处理奖赏的递呈程序方面。相比之下，1081 年的赦令在某些方面居中。

这四类文献形式是了解宋朝军事体制的一种重要依据。从列举的立功行为来看，按中国人的观点，是被理想化地渲染了。相反，惩罚性规定则显得，之所以失利受罚，是由于种种客观不利因素所致。在一种极其机械思维的方式下，奖罚作为动因便很有成效地发挥着它的作用，人们可在这些军令类型中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除以上叙述过的四类主要军令形式和文献外，另一主要文献即是规定了西夏军队奖赏的《玉镜统》，尤其是该文的第四章，该章较好地提供了奖赏（报酬）方面的情况，即它的目录索引保存完整，甚至逐项条款的主要部分，包括该章的结尾部分都保存了下来。这份文献的良好保存，也是克恰诺夫教授不久前单独出版《玉镜统》第四章原文和俄译本的理由^[4]。

论西夏军法

1. 共同性。西夏军法典《玉镜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虽然克恰诺夫翻译的原文部分包括了列宁格勒保存的全部原件。尽管如此，在整体上可以推出一些逻辑性结论。保留下来的残片中明确提到的是第一章至第四章。问题是，《玉镜统》的原件是否含有多于这四

章的内容。保存下来的第一章连同序言总共列举了9项条款，然而根据推测，第一章可能包括更多的条款内容。第二章保存了完整的目录索引，它列举了不少于78项条款。但原件保存下来的只有一至四项条款。第三章的目录索引列举了33项条款，但原件只保存了14项条款，其余缺失。最为完整保存下来的是含有关于军功奖赏规定的第四章。依照克恰诺夫的计数，它由16项条款构成，登在第1b页（见摹真本第57页）^[5]，末尾印有“进胜篇”段落的第九行不属于该章所列举的内容，它大概是介于条款之中的标题之类，并且和附录不同，因而是可辨别的，较低排印的这三个西夏文字是作为该章前导的16项条款的标记。

正如残片中所显示的，西夏军法典的文字是这样排列的：每一章的开头用简要词语将条款的目录放在主文的前面。在中世纪的中国，其法典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排列方式，如宋朝的《宋刑统》；反之，在元代，虽然公元1320—1322年由法令、判例编集成的《元典章》每篇也有概略语，然而当该篇开始时使用全文的一个目录索引置于有关的章节中。《元典章》的这种排列，是以唐朝的《唐律疏议》为蓝本的。该法典即在主文的开头用概略语同条款的全部目录并列在一起。

尽管《玉镜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可以从发现的残片中逻辑地作一些推论来同宋朝的军法作一比较。最初的影响是，西夏军法典比宋朝军法详细得多。它是一部法律著作，比起宋朝的军法，它较严格地处理了赏罚事宜，也即它对应处罚的行为又对应奖赏的行为列举了很多的情况和类型。对此，首先可在第二章的目录索引中看到一个好的例子，它在赏罚行为前面总是先从高到低地将指挥官的全部职衔单独归在一起。相比之下，在宋朝的军规中对此方面的处理则是相当概括性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西夏在《玉镜统》中制定了一部普遍有效的军法，总的来说它对军队普遍适用。相比之下，宋朝的军法规定用于不同的时期和事态，并在每次实施时将之限制在某前线。在宋朝，好似没有打算过编纂一部普遍有效的军事法典，无论怎样，反正没有这样的法典保存下来。不过倒有普通刑法——《宋刑统》这样的部门法。而《玉镜统》则对所有潜在的对手并且对所有战区都普遍有效。事实证明，西夏所指的敌人既是中国人即宋朝，又指契丹人即契丹辽国。

西夏和宋朝的军事法律虽有以上这些区别，但仍需强调两者主要方面的一致性。尽管不会说《玉镜统》是译自宋朝的法律，但西夏军法内涵的精神完全与中国的军事思想相适应。作为指导原则，对军事体制来说，奖罚的思想在宋朝和西夏的军法中是一致的，只是西夏的军法典比宋朝的军法规定相对而言得要详细、完善得多。对此，克恰诺夫教授在1976年就已经指出了《玉镜统》的本质特征^[6]。他指出，《玉镜统》无疑受到中国军法的影响，它的一些规则与《武经总要》第十四卷中的规定有些类似。当然，《玉镜统》里规定的量刑标准比《武经总要》中规定得宽些，即在規定死刑的方面较宽些。例如，根据《武经总要》，有人如果拿别人获得的首级骗取奖赏或谋求晋升，就被处以死刑。相反，在西夏，出现同样的行为，则处以贬黜、罚三匹马或强制劳役。《玉镜统》中规定的惩罚有枭首、终身强制劳役或只一段时期（13年）、黥面和以重棍处罚，以及以马匹形式的财产处罚，此外还有降级。在西夏军法中既无罚款，又无实物处罚，而是罚以马匹相抵。这可解释为，在额尔多斯草原有广袤的地方可供养马，西夏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通过售马进行，所以，在西夏，对国库和私人，马匹都是最重要的财产。

《玉镜统》中对战功的奖赏有晋升、摊派兵役、银杯或金杯（每次说明重量）、服装、

以贵金属装饰的腰带、丝绸和茶叶等。除茶叶和摊派兵役的奖赏外，西夏的军事奖赏与宋代流行的军事奖赏恰恰相同。此外，西夏军赏体制中显然没有在宋代军赏体制中所特有的这几种形式，即赏以黄金、硬币和纸币。在按军功计赏方面，西夏和宋朝一样也完全根据算术的准则处理，奖赏按上缴的战利品多少而定，将作为战利品的首级、俘虏、马匹、武器、军事装备品、旗帜和战鼓先分成等级，然后再以此去抵消自己所受的损失，如损失大于所获，该军指挥官则受到追究。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宋朝 1044 年颁布的敕令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国军法体制中集体责任（处罚家庭成员）的原则是确定的。如果一个指挥官在战争中阵亡，那么他的个人卫兵也要被处死。其他的共同性在于奖罚的轻重从高到低按涉及的人员的职衔而定。

《玉镜统》第四章一开始，给我们列举了西夏军队最主要的职衔，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概况。它从高到低有以下职务：（1）都统军和副统军。（2）行军司马，他可能是被任命为一支尚未开战然而已被动员了的军队的将官。（3）兵马都监，这一称号使人联想起宋朝军队中许多带双名“兵马”（步兵和骑兵部队）的复合头衔^[7]，在宋朝，这一职务与一支有确定数量的指挥权不是绝对相符的，如文献提供的，它只会是指挥数百或数千人，对西夏军队也可如此认为。（4）“头目”，可能相当于排长或班长，这一职务一般是老少结合的。（5）普通的士兵。

西夏军队中的职务都是正职和副职相配的。我们在《玉镜统》中还看到许多其他的职衔。使人感兴趣的是“林人”（der waldmensch）的称号。人们大概会猜想，这同中国的“番兵”、“未开化的士兵”等称呼相当。然而从上下文来看，“林人”意为低级武职。此外，班长或伍长（Rottenfuehrer）也是下层军官，他们也属“林人”的范畴、“殿后官”或“后卫官”（Schliessende oder schlusssmann）。总之，所涉及的此种职务同宋朝军队中的监军职位可能是一致的。有这种职务的军官手拿刀剑督促士兵迎战敌人。^[8]西夏军队中可能也有这种类似的职务，即军队和行政中重要的下层职务（Richtungsmänner）。在低级军衔中，我们在《玉镜统》中还看到给养员和军需官。《玉镜统》中对所有这些低级的军衔没有指明对等的宋朝军衔。当然，宋朝军队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军衔。《玉镜统》中还常常出现“秩序将”（即监军使）的措辞。“秩序”在这里很可能指的是“战阵”（中文“阵”）。它的职能是部署军队进行战斗。西夏同宋朝一样也有荣誉称号的部队。例如在《玉镜统》中出现的“勇威”称号的部队，这可能是一支京城近卫军或其他精锐部队。最后，由西夏军法典还得出，西夏同宋朝一样，军人职业是世袭的，职衔也可能继承。

可从以上所述概括地得出，西夏军制类似于宋朝军制。相对来说，前者的确不是无组织的一种军事集团的堆集，而是组织得官僚化、极为精细入微并以宋朝军制为蓝本受制于军法的战斗集团。我们从《玉镜统》中也得知有关处理一些战斗行为的规定完全与宋朝的军规相符。克恰诺夫的俄译文也提出了西夏和宋朝两方战争指导原则的一种比较意见，它们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可的确也有许多一致性。当然，与宋朝军队的规则相比，《玉镜统》就规定得非常详细和严格。

2. 有关《玉镜统》的细节。对《玉镜统》中一系列的表述，尤其是中文词语的发音，从汉学方面提供一种简短的评注是值得的。有时也有必要如中文词典一样指出西夏文字的索引。较为经常引证的参考资料缩写如下。

克平、科罗科罗夫、克恰诺夫和捷连特夫—卡坦斯基翻译并出版 《文海》，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1969年。

索井罗诺夫 《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

马修斯 《汉英词典》，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1950年。

缩写词后面涉及的数字是有关西夏文的号码，即 M、S 和 R 的中文字母，而不是页数。

(1) 宋朝军衔多次出现在《玉镜统》第二章的目录索引中。《玉镜统》中规定，俘虏或杀死有军衔的宋朝人员获赏 (S. 11)。军衔 (克恰诺夫注音) 为团练 (tuan- lian)、总管和佐官。军法典中是按高低次序排列的，即团练高于总管，总管高于佐官。西夏 thon- lie (团练) 的中文表达无疑比 tuan- lian 充分些。该军衔在宋朝军队等级制中是一种基本的军职^[9]，通常译为“乡兵将官”。当然，乡兵将官的品位不是很高，在正从九品制内，它的品级是从五品^[10]，副职是从八品^[11]。尽管如此，总管或佐官比团练级别低。除发音外，西夏文 tson- kwan 与中文 tsung- kuan 显得完全一致，尤其从 M2573 条得出，西夏文发音的第一个音节在中文的 fan- chieh 读为 chi (旧音是 tsi) (R459) 加 hung (R2383) 注音，它也以 tung 发音。但有关其语义学的情况不太清楚。在宋代，总管 (R6912 第 58 条) 的中文含义标志着一个较高级的将官^[12]，这恐怕有点不适于这一情况，即有这一职位的将官会位于一个乡兵将官之下。在唐代，总管职衔是军中下层军官，在军制中有此规定。依此规定，除下级军官外，一个高级将官有四个总管，两个左虞候，两个右虞候。虞候在某方面相当于一个中士。《宋代官职索引》第 3415 条中将 “yü- hou” 译为“监督官”^[13]。宋代的虞候是无品武职，不属军队中较高的军职。所以，在《玉镜统》中，tsung- kuan (西夏文 tson- kwan) 很可能表示诸如此类的下级军官，决不会表示一位“将帅”。

用中文 tso- kuan 表达西夏语 tson- kwan 与宋军军衔不可能是一致的，这点是肯定的。汉语 tso 由 M4400 (S4797) 所证实，这一符号属于韵级 tso (R6780)。中国的语言学者李范文提出了另一发音改换^[14]。他确定 tso 为 tsā，并将之增补到中文韵级 tso 中 (R6774)。但这一问题最终还没有完善地得到解决。有把握的只是，西夏文的 kwan (S54151, M840) 一定表达为中文的 kuan “官员” (R3552) 或同一发音 kuan “管” (R3557)。对此我们给 tson/tsā 的中文同义词提出这一种猜测，即它们之中的一个可能来源于中文的 “tso- kuan” “左官”，然而，Morohaschi 大词典对此只提供了自汉代的证据^[15]。同样不确定的是，西夏文 tson/tsā 可能同中文的 tsán “参与、商议” (R6685) 有关。在宋代，虽然 tsán 和 kuan 合为双名称号^[16]，联系到术语汇编，克恰诺夫在对西夏法律文献的译文中和编辑中给西夏文字 tson- kuan 注明为中文音素 tso- kuan，如在《玉镜统》的译文中，他在说明和翻译这一词时用了问号 “一种官职？”^[17] 总之，它事关职务或官职这点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它究竟意指什么，目前仍悬而未决。

(2) 《玉镜统》中对较高军官规定的奖赏有一种是兵役义务，这多次被提到。所指的兵役义务可能是给某类人当侍从，甚至是将帅的随从。第一，西夏文字可能没用西夏词汇表述，而是借用了中文。据 S5149, tšhew，也为中文 “差” (chā) “家务” (R275，可选择的发音有 tsě、chě 和 tseh) 的注音所证实。克恰诺夫探讨了该词的词源，建议将西夏文字 tšhew 看成中文 “抄” (chāo) “侵袭、充公” (R225) 的一种改写。这也许完全符合这个意思，不过它也可能提出另一至少同样值得讨论的词源，即中文的 “差” (chāi) “效劳、服役义务 (尤其指劳役)、勤务” (R105)。此外，用 chái 这个词复合成的职务名称也多次出现在宋代官职中^[18]。

(3) 前面已指出,“林人”是对西夏军队中相当于二级下士军衔(部领)的称号。对此应注意到克恰诺夫在西夏军法典术语表中的一点补充。他在指出“林人”这称号也可以是“森林”时,是以定语的形式使用的(俄语 Lesnye)。在俄译文中,克恰诺夫同时提出该词为“属军职范畴的一个名称”^[19]。但这名称如何出现的问题,至今没被讨论。这里应对此简要加以论述。“林人”与二级下士军衔相对应这点,大概无可争议。西夏语“mbo-ndzvwo”(林人)无论如何与中文“虞候”、“中士”相关,我认为这点是确切的。这在(1)中已提到,并且还出于以下根据。中文词“虞”也有如“不受约束的天性,空旷的大自然、山脉和低洼肥沃滩地”一样多的意思,并见就“虞人”来说,R2754(C)指出“yü-mensch”(虞人)为像林务员一样的“山林居民”。不仅虞人而且虞候有“护林员、猎场看守人”的意思,这已在前汉时代的史料中得到证实。虞候作为一种军职名称,在汉朝已出现,并且从那时起便成为军事等级别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那些受到中文词语虞人或虞候影响的西夏学者为本国想出这一军衔用语是有可能的。我对此提出的假设性说明,西夏的“林人”和中国军队中的虞候与二级下士职衔有关,这点值得注意,无论如何,它们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4) 《玉镜统》在涉及军功赠礼或奖赏时,在所赠实物中多次出现用贵金属制成的腰带扣(西夏语为 Khew-se)。这两个西夏文字符号 S4010(M4160)和 S3750(M916)是借用汉语而来的西夏语言化了的改写的文字,并且可能是由中文 kòu-tzu(R3439第2条)演变而来,它的意思为“纽扣”。可假设的一点是,汉语词 kò-ssu(R3322,5571)可能是首先在宋朝丝绸厂生产的一种特别精细、质量很高的彩色丝绸品。

(5) 《玉镜统》中时常列举的战利品有以下几类:人员、马匹、作战装备、马匹用具、旗帜、鼓和金。读者大概会望文生义,认为后一战利品是黄金物品,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相反,“金”可能是汉语中以金的词义为基础而有一种特殊的意思。西夏语发 kei 音,并且在“金”的含义上既有音素又有语义的因素,这由古西夏词典所证实(S226和 M2020)。可是,在汉语里,作为“金”(chin,R1057)这个词也用作普通(如青铜)的金属,并且也用于金属制成品。鼓金(青铜)的合用在中国军制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所谓击鼓进攻、鸣金收兵即指此。鼓和锣对每一支中国军队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物。中文称鼓为 ku(R3479),并且鼓金或金鼓这种双名用法在古代中国就时常出现^[21]。因此,《玉镜统》中西夏语“kei”也如中文的“金属、金属制的东西,铃或钟、锣”一样,而不应被理解为贵重金属。

(6) 如何理解“chih-wei”——它先是由 wade-Giles 改换并由克恰诺夫以“Чжцъэц”改写为俄语的表达——的含义,给我们造成一件难事。它在《玉镜统》中只出现了一次,即摹真本第10页第2章第2行。文中指出,“在 chih-wei 的情况下,幼牡马和幼母马不应视为奖赏”。这里的西夏语决不意味着是一个西夏文字,而一定是体现了一个由其他语言改写的词。这词的音素是 tsie(S51,M3358)和 ngwe(S3343,M3031),改换为中文 chih-wei,至今是 chieh-wei,也许是正确的。但我不能成功地找出一个中文的双名,让人们将 chih-wei 或 chieh-wei 连贯起来发音。鉴于这种理由,我只好向克恰诺夫教授请教。他详细地研究了 my 的问题,在 1989 年 9 月 25 日的信中答复说,在西夏文有双名用法的情况下,不可能是中文,而是再现了一个土耳其(维吾尔)语或契丹语的词语。据这一解释,对这个概念还是不十分清楚。克恰诺夫教授认为, chih-wei 可能意味着掠夺到的马匹的一部分,

但也不排斥，它会事关减少大量的军功奖赏。chih-wei 或 tsie-ngwe 的准确含义究竟为何，至今不得而知。

3. 译文（略，只注明文献出处）^[22]。

（1）1004 年颁布的敕令。（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第 7 册《刑法》第 6734/II—6735/I 页，上海：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本。

（2）《武经总要》中有关军功奖赏规则。（宋）曾公亮、丁度著《武经总要》，第十四卷第 1a—7a 页，上海：中华书局，1959 年版。

（3）1081 年颁布实施有关奖赏的敕令。（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第 8 册《兵》第 7061/I—II 页，上海：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本。

（4）1127 年颁布的有关奖赏的条文。（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第 7 册《刑法》第 6747/II—6748/II 页，上海：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本。^[23]

注释：

①该文全称为《论 11—13 世纪西夏国和宋朝的军事立法——一份文献研究报告》。[苏]克恰诺夫、[德]弗兰克（Herbert Franke）著，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1990 年出版。本译文是其中的一部分。弗兰克先生是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的带头人和慕尼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也是巴伐利亚科学院中亚研究委员会的学术领衔人，他原是慕尼黑大学的汉学教授，战后曾担任过德国东方学会主席、国际东方学会联盟秘书长、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科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退休后任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主席、中亚研究委员会理事，他是研究宋、辽、金、元史的专家。克恰诺夫教授为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长。

②弗兰克在《中国杂志》（1984 年 11 月）第 19—24 页发表的《西夏文发音学词典〈文海〉的中文版评论》中，提供了西夏语言学特别是它在苏联的发展概观。对哈拉浩特出土文物的记事和处理情况参看弗兰克的《中国哈拉浩特的出土文物》（《东方学文献报》1986 年第 81 期第 117—129 页）。

③本“导论”由克恰诺夫所写。

参考文献：

- [1] 克恰诺夫. 西夏法律文献（12—13 世纪）[M] // 第二十九届东亚国际大会论文集. 巴黎：亚洲，1976：29—42.
- [2] 《玉镜统》残片序言第 9 页，第三章第 10 条.
- [3] 艾里克·格林斯提德. 将苑，一本十二世纪的军事著作 [J]. 英国博物馆，第十六卷，1963（1—2）：35—37.
- [4] 克恰诺夫. 西夏军法摹真本（《Pravila nagrazdenija goroev varmii S: Sja》）[M] // 东亚语言和历史（上）. 东京：Shokado，1988：119—135.
- [5] 摹真本复印件及我国学者对《玉镜统》的研究，详见：陈柄应著. 贞观玉镜将研究 [M].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 [6] 克恰诺夫. 西夏法律文献（12—13 世纪）[M] // 第二十九届东亚国际大会论文集. 巴黎：亚洲，1976：29—42.
- [7]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 1497—1504 条.
- [8] 曾公亮，丁度，著. 武经总要（第 3 册）[M]. 上海：中华书局，1959：10B.
- [9]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 2805 条.
- [10]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 2805 条.
- [11]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 2806 条，“团练副使”.
- [12]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 3127 条，“将帅”.

- [13] 罗伯特·德斯·罗特马斯也持此义，见：论官衔和军队 [M]. 荷兰，莱顿：E. J. 布里尔，第2卷“唐代”，1948：647.
- [14] 李范文. 同音研究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8/a条.
- [15] Morohashi, Tetzuj, Dai kanwa jiten [M]. 台北翻印，未注明年号，第4卷第352/I页.
- [16] 宋代官职索引 [M]. 第28690、2865条.
- [17] 克恰诺夫.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dennyi kodeks deviza Carstvovanija nebesnoe procvetanie [M]. Kniga 4,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638/b.
- [18] 《宋代官职索引》，第2009 – 2014条.
- [19] 克恰诺夫.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dennyi kodeks deviza Carstvovanija nebesnoe procvetanie [M]. Kniga 4,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654/b.
- [20] Morohashi, Tetzuj, Dai kanwa jitem [M]. 台北翻印，未注明年号，第9卷第1076/IV页，（关于虞人）和第1075/III页（关于虞候）.
- [21] Morohashi, Tetzuj, Dai kanwa jitem [M]. 台北翻印，未注明年号，第12卷第1060/III页（较早的证据已在《左传》中就有。关于“金鼓”见《Dai kanwa jitem》第11卷第458/II – III页《左传》、《孔子》、《史记》及其他等等史料。“金鼓”也是古代军事论著《六韬》第4卷第38章的标题。参看由福尔克·施特兰茨译的《六韬》——一本古代后期关于战争艺术的著作。巴特霍涅夫：保克和赫尔章出版社，1979年（明斯特汉学的报告第1卷），III（“钟和鼓”）。“金鼓”在唐令中也出现，见《Niida, Toryo shui》第13章第373页.
- [22] 摹真本复印件及汉译和注释，详见：陈柄应著. 贞观玉镜将研究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65 – 102.
- [23] 弗兰克. 论中国中世纪军刑 [R]. 会议报告，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哲学历史部，1970（5）：11 – 13.

A Literatur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of Xixia Dynasty

Frank and Yue Haic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translation to the work about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of Xixia Dynasty by Frank of Germany. The contents of this paper cover the military law of Xixia Dynasty and the comparison of Xixia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is aspect.

Keywords: Xixia Dynasty; military law

（责任编辑 魏淑霞）